·中日文化比较研究丛刊·

东亚文明的共振与环流

Dongya Wenmingde Gongzhen Yu Huanliu

徐静波　胡令远●主　编
屠承先　陈永明●副主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王　勇

血缘交融与东亚文化圈的形成 …… (1)

盛邦和

从“原型亚细亚”到“太平洋亚洲文明” …… (23)

陈广宏

论明代文学在日本的传播 …… (45)

邵毅平

朝鲜、日本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受容与抵抗…… (69)

张寅彭

东亚三国诗话异同考略 …… (95)

戚印平

文人画理论在江户时代的影响…… (111)

陆留弟

中国茶文化与日本茶道文化简论…… (132)

徐静波

论近现代日本翻译文学兴起的社会文化背景 …… (151)

张冠增

世界文明之中的日本城市——从理念到现实 …… (172)

王宝平

中日漂流民赠答诗勾沉…… (198)

胡令远　郑利华

源流之间…… (220)

张东苏

以汉字文化圈为视野的中日汉籍交流史研究 …… (236)

惠　琴

同情及其界限…… (252)

编后记…… (260)

王　勇

杭州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教授

血缘交融与东亚文化圈的形成

纵观东亚的历史，逐草而徙的游牧民与营田而居的农耕民在冲突与融合的过程中，演出了一幕幕动人心魄的悲喜剧，构筑起这一区域混合文化的基调。

疾风骤雨般奔驰大漠的马群，顶风破浪横跨巨洋的船队，避乱求生而浪迹天涯海角的移民——亚洲地区的民族迁徙和物资流通，自古迄今未曾有过停息；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形成错综交叉的共存关系。

当我们注目于亚洲的东部，肥沃的黄河流域展呈在眼前，这块富绕的平原与四周的山地、海滩、草原、沙漠形成鲜明的反差，诱引各路豪杰“逐鹿中原”：胜者君临天下，败者退避四野。

战争既打破了旧的秩序，又整合出新的格局。随着秦汉帝国的建立，东亚文化呈现出诸流交汇的势态，一个以中国为核心的文化圈渐具雏形。这种文化联体的形成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各民族之间的血缘交融，因为兼具双亲血统的新生一代，肩负着继往开来的历史重任。

一、夏子与韩子

本世纪70年代，在湖北省的云梦睡虎地发掘出一系列秦墓，从11号墓出土竹简1100多枚，内容分为《编年记》、《语书》、《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式》、《为吏之道》和《日书》共9种，墓葬年代推为秦始皇三十年(前217年)[①]。

按照《秦律》记载，秦的属国分为臣邦、属邦、他邦，“真臣邦”的君公若有罪，可以享受以物赎罪的特权。《法律答问》对这条律文进行阐释，据此可知臣邦父母所生子女谓之“真”，臣邦男子与秦朝女子所生混血儿称作“夏子”。

这里的“真”大概代表“纯种”，以区别于混血的“夏子”，说明当时华夏民族与周边民族的通婚现象极为普遍，需要用专门的词汇来标识后代的血统。于是，“夏子”一词成了文献中最早出现的混血儿的代称。

依照封建社会的贯例，混血儿的归属一般从父。那么，臣邦之父与秦朝之母所生子女，为何不称“臣邦子”，而谓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夏子”呢？一种可能是受母系社会的影响，另一处可能是文明程度的折射。笔者倾向于后者，即认为混血儿的归从，小而言之则为父母两方的财力所左右，大而言之则取决于两国文明程度的比差。

在父权至尊的封建社会，尤其当各国民族意识趋向高涨的时期，混血儿的归属问题便会变得更为复杂。文明程度、贫富差别、民族意识、男妇地位等诸种因素交叉混合，当事双方极易发生利益冲突，甚至酿成夺子抢女的国际纷争。

朝鲜半岛的南部，与日本的九洲隔海相望，人分马韩、辰韩、弁辰3种，秦人避乱多有至者，倭人亦渡海杂处其间。《后汉书·东夷传》记云：

> 马韩在西，有五十四国，其北与乐浪、南与倭接。辰韩在东，十有二国，其北与涉、貊接。弁辰在辰韩之南，亦十有二国，其南亦与倭接。……辰韩耆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适韩国。……国出铁，涉、倭、马韩并从市之。

大约在4世纪前后，任那在近海的弁韩（弁辰）旧地形成部落联盟，聚居此地的倭人不仅数量众多，而且还有可能统治着若干部落。《日本书记》中所称的“任那日本府”，大概指的是这些移民部落亲日的移民部落，而不一定就是大和朝廷直接设置的行政机构。

进入5世纪以后，任那的归属成为日韩争端的焦点。刘宋元嘉十五年（438年），倭王遣使朝贡，上表求封“使持

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文帝仅“诏除安东将军、倭国王”，对包括任那在内的朝鲜五国统治权未予认可。元嘉二十八年(451年)，加封倭王为“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以加罗顶替百济，算是部分认可了日本在朝鲜的权益[②]。

日本热衷于经营朝鲜事务的大和时代(约当4～6世纪)，虽然在军事上称雄邻邦，但在文化方面尚远远落后于朝鲜诸国。这种畸形的发展，往往诱发与邻国的争端，尤其在日韩杂居的任那，矛盾就显得更为突出。

继体天皇二十四年(530年)，任那遣使赴日，状告日本驻军首领近江毛野臣耽于享乐，玩忽职守，滥用刑法，多杀无辜，因而引起当地人民的不满，影响了日本与任那的关系。兹从《日本书纪》引录原文：

秋九月，任那使奏云：毛野臣遂于久斯牟罗起造舍宅，淹留二岁，懒听政焉。爰以日本人与任那人，频以儿息诤讼难决，元无能判。毛野臣乐置誓汤，曰：“实者不烂，虚者必烂。”是以投汤烂死者众。又杀吉备韩子那多利、斯布利，恒恼人民，终无和解。

继体天皇二十一年(527年)六月，毛野臣奉命率众6万，往赴任那，加强日本对该地区的控制。其时，筑紫(今九洲)国造磐井梗阻大和朝廷与朝鲜的通路，欲独占海外贸易的利益，遂起兵谋反，史称“磐井之乱”。

大约经过 2 年，磐井之乱平息，毛野臣始得渡海。然而，毛野臣热衷于营造豪邸，置职守于不顾。如前所述，倭人居留任那者甚众，与韩人通婚相当普遍，争子夺女的事件频繁发生，自古以来难判是非。面对这类事涉两国的纷争，毛野臣未从各自的国情出发，进行客观公正的处理，而是套用日本自古相传的“誓汤”神判，屈死者不可计数，激化了日韩人民的矛盾。

誓汤亦云探汤、盟神探汤，一般指争执双方指神盟誓，然后探手于沸水，理曲者不死即伤，无辜者则可幸免。但具体作法因地制宜，并不拘于一格。如《日本书纪》允恭天皇四年(415 年)条注云：“或泥纳釜煮沸，攘手探汤泥；或烧斧火色，置于掌。”《隋书·倭国传》中也有类似的记载：

每讯究狱讼，不承引者，以木压膝，或张强弓以弦锯其项；或置小石于沸汤中，令所竞者探之，云理曲者即手烂；或置蛇瓮中，令取之，云曲者即螫手矣。

这种残忍的神判古法，在日本鲜见施用，《日本书纪》仅载二例，一次是应神天皇九年(推为 317 年)，甘美内宿祢枉告其兄谋反，两人对质公堂，探汤以辨是非；另一次是允恭天皇四年，公卿豪神竞相伪造系谱，夸示出自高门，朝廷令行盟神探汤，以定姓氏真伪。

毛野臣施用此法判定混血儿的归属，一方面表示其不谙国际事条，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国际婚姻引发的矛盾冲突

已达不可收拾的地步。

让我们再回到前引继体天皇二十四年的记事，任那使控告毛野臣“杀吉备韩子那多利、斯布利”，《日本书纪》在这里有一条注文：“大日本人娶蕃女所生，为韩子也。”意思是说，日本男子与外国（这里主要指任那）女子通婚，所生混血后代称为“韩子”。

那多利与斯布利即是两位日韩混血儿，《日本书纪》称他们是“吉备韩子”，其父当姓吉备氏，两人很可能是兄弟。他们被杀的原因不明，但既死于毛野臣之手，又引起当地人民的不满，而且成为任那使状告毛野臣的依据，那么可以想象在日韩发生纠纷之际，这两位混血儿是站在任那一边的。

夏子与韩子是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历史发展的产物，但是两者之间具有超越时空的共性，即他们均是民族交融的结晶，均是混血儿的代称。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夏子和韩子都是以母方种族命名的，说明混血的后代在文化上亲近发达一方。在他（她）们的身上，最能典型地反映出在民族文化的交流过程中，文化发达的中心地区是如何兼容异质文化的因子，进而向四方播散文明种子的。

由此推论，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的形成与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乃是各民族之间的血缘交融在文化上的体现。这是一个缓慢的渐进过程，但对文化传播而言，却是最为坚实可靠的基础工程。以中国文化的东传为例，秦汉

之际汉人先是大举迁徙到朝鲜半岛，在与土著同化过程中播种文明；接着，在与汉族的血缘及文化交融中的诞生的后代，继续与东方的倭人进行血缘的交流，并把文化因子遗传给新生一代，如此循环往复，东亚各族在血缘交融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超越民族和国家的文化共同体。

当然，考察文化圈的形成，不能忽视政治、经济、地缘等其他因素，但人既然是文化的创造者、传播者及享用者，那么人种的交融必是其中最为基本的要素。而且，人种的交融同化一旦达到某种程度，甚至可以彻底改变某个区域的文明的自然进程，使之出现惊人的跳跃性发展，有关这方面的实例，我们可以公元前 3 世纪前后日本的绳纹时代与弥生时代的历史性交替为例。

二、弥生人溯源

在人类的祖先刚刚诞生的洪积世时期，日本与亚洲大陆连成一片，到了距今约一万年前的冲积世初期，地球气温转暖，海平面逐渐升高，日本脱离大陆后成为孤悬于西太平洋上的岛国，并进入独创文化的绳纹时代。

在绵延数千年的漫长岁月中，绳纹人尽情享受着大自然的恩赐，将石器文化发展到令人惊叹的高度。从出土的陶器、土偶、石器、骨角器等看，其加工之精妙、样式之丰富、造型之优美，实为世界其他地区的同类遗址所罕见。尽管

如此，以渔猎采集为经济基础的绳纹社会内部，始终未能积聚起足以引起时代更替的巨大能量。

公元前3世纪前后，日本列岛上臻达极盛的新石器文化猝然而止，先进的金属文化伴随水稻农耕出现在九洲北部，并迅速扩散至列岛各地，弥生时代由此揭开帷幕。

弥生时代的文化绝非绳纹文化自然演进的结果，两者之间虽然也能寻绎出某些微弱的承继关系，但在更多的方面则显示截然不同的倾向。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是人种的差异。

金关丈夫教授曾对北九洲地区的土井浜、三津等遗址进行考古发掘，通过比较出土的人骨化石，确认弥生人比绳纹人身材更高、脸形显长等特征，并推断这是外来移民与土著人种(绳纹人)混血的后代。

弥生文化在日本历史上突如其来的出现，无疑是一种高度发达的外来文明汹涌而入的产物。根据小山修三的统计，除北海道以外的日本全国人口，绳纹后期(距今3300年前)为16万1千人，弥生时代(距今1900年前)为60万1千5百人[③]，两者相差近4倍，这种人口数量猛增的现象，说明弥生时代大量外来人口移徙日本列岛。

那么，负载金属文化和水稻技术的外来移民，又是来自何方的呢？一般认为，这些移民来自朝鲜半岛和长江流域。安志敏先生在《江南文化与古代的日本》[④]一文中，从稻作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农耕、干栏式建筑、玦状耳饰和漆器、鬲形陶器和印纹陶、吉野里遗迹、海流和交通诸方面，详细论证了弥生文化与江南的渊源关系。笔者基本上赞同安氏的意见，并进而推断，日本那些自称"太伯之后"、又能航海通吴的部落国家，很可能是以吴越移民为主体创建的[5]。也就是说，在弥生时代初期的外来移民中，从江南一带越海东渡的吴越移民占据主体地位，当然也不排除来自朝鲜的移民集团的存在。

接下来的问题是，外来移民如此大举迁徙日本列岛，出于何种动机和背景呢？从世界的历史来看，大规模的民族集团迁徙，往往有其社会原因（如战争、役病等）或自然原因（如气温、旱涝等）。有些日本学者认为，引起绳纹时代与弥生时代猛然交替的大量外来移民，跟当时的气候变化关系密切。

根据地理学家铃木秀夫教授的研究，距今约3500年前（绳纹后期中叶），东亚的气温逐渐下降，即出现寒冷化现象。阪口丰教授通过一系列的推算，得出更为详细的数据：距今3200前至距今2400年前为第一次寒冷期，此后的300年间气温一度转暖，从距今2000年前又出现第二次寒冷期。埴原和郎博士依据这些气候变化的资料推断，在第一次寒冷化出现时，北亚的民族开始向温暖的南方移动，到了第二次寒冷期时，这种南迁的速度进一步加快，而在时间上恰好与弥生时代的开始相对应[6]。

将公元3世纪前后的大陆移民东徙的原因归于气候的变化，虽然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是上述解释的最大缺憾是没有同时兼顾到这一时期东亚的社会变动，而且将移民的主体断为北亚人种亦与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不甚相符。

首先，让我们简略地回顾一下东亚的国际情势。

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击败吴王夫差，雪了"会稽之耻"。《资治通鉴》云："今日本又云吴太伯之后，盖吴亡，其支庶入海为倭。"说明吴人亡国后四散，一部分跨海东徙。

公元前333年，越为楚威王熊商所灭，"诸公族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海上，朝服于楚"[7]，从此散为百越。迨及秦并六国，一统中华，江南之民纷纷流徙避乱，驾舟东迁者当不在少数。《越绝书》有"内越"和"外越"之分，"外越"亦作"东海外越"，包括越海为倭的一支。

秦汉帝国出现前后，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次历时长久、规模空前的民族迁徙运动，向东迁徙的路线分为南北两途，北方民族大抵移居朝鲜半岛，经历数个世纪以后，也有部分集团继续东迁日本[8]；南方民族唯有跨海东渡一途，他们登陆的地点散布在冲绳群岛及日本西南海岸的广阔区域。

接下来，让我们探讨一下最先移居日本的民族集团来自何处。

在交通手段尚不发达的古代，海途远比陆路要来得快捷[9]。试想利用海流或者风力航行，从江南横渡东海费时

最多不超过几周；而经朝鲜再达日本，往往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因为他们最先的目的地未必就是日本，一旦在朝鲜找到合适的地点便定居下来，在后续移民的推压之下再逐步向东移动，直至最终渡海到达日本。

根据以上的分析可以断定，公元前 3 世纪前后大举东渡的移民集团，应当是江南一带的吴越民族，而非在寒冷气候逼迫之下南迁的北亚民族。弥生时代初期的移民集团将水稻农耕技术带到日本列岛，雄辩地证明他们属于南方的农耕民族，而不是北亚的骑马民族；再则，成书比《三国志》更早的《魏略》（鱼豢），说倭人“男子皆黥面文身，闻其旧语，自谓太伯之后”[10]，说明弥生人与吴越人有很深的涵源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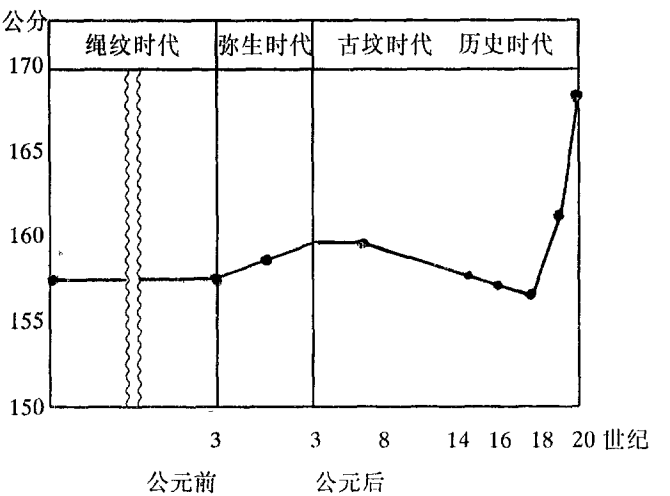
南方的农耕民移居日本列岛后，不可避免地与土著的绳纹人发生人种的交融，从而形成混血的弥生人。由此而言，弥生文化也是一种融合外来因子和土著因子的混合文化。

弥生人的“混血说”，最早大概是由京都大学的清野谦次教授在 40 年代提出的，50 年代得到金关丈夫教授的考古学方面的佐证后，逐渐为学术界所公认。通过对九洲出土的人骨化石进行测定，人们发现弥生人的身长明显高于绳纹人，经过推算得出的男子平均身高值如下表：

年　代	遗　址	平均身高
绳　纹	津云贝冢	159 7m
弥　生	土井浜	162.8m
弥　生	三　津	162.0m

弥生人的平均身高约比绳纹人高出 3 公分，对于这种人体特征上的明显差异，金关丈夫教授作出如下解释："第一，新的文化的流入所引起的生活方式的变化，对人体特征产生巨大影响。第二，通过与为数不多的外来移民发生血缘交流，其结果反映在混血后代的体形上。"[11]

金关丈夫认为参与混血的外来移民"为数不多"，引起弥生人体形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外来文化的大量流入。铃木尚先生进而排除混血的因素，认为身高的波动完全取决于生活方式的改变，并画出下列图表，用以说弥生时期与明治时期出现的身高变化均是文明影响的结果[12]。



但是，明治时期日本的急速西化，是以频繁的外交活动和经济交流为基础的，同时派遣留欧学生、聘请外籍教师等教育制度的根本性改革也促进了西方文化的流入；然而在弥生时代，大陆方面和日本列岛均无如此强烈的输出文化或摄取文化的意欲，文化只不过是民族迁徙的伴随品而已，因此两者不可相提并论。

血缘和文化的交流均能改变人种的体形，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问题是在某个特定的时期，哪方面的影响更大些。一般地说，弥生时期血缘的影响是主要方面，但也不能忽略文化的因素；明治时期文化的影响是主要方面，同时也不能排除混血的因素。总之，混血和文化代表事物的两个方面，不能视为引起人种体形变化的唯一因素。

埴原和郎教授对弥生人的混血率进行过别开生面的测算，他将身高的变化视作遗传的量化表现，测出土井浜人的混血率为 1:1.25(即绳纹人占 1，外来移民占 1.25)，三津人的混血率为 1:0.8[13]。也就是说，在土井浜人与三津人身上，移民的血统平均约占 50%，由此断定这是第一代混血儿。

综上所述，公元前 3 世纪前后，长江流域的农耕民族因相继亡国而大举东渡避乱，他们负载的高度文明和先进技术席卷了进化缓慢的绳纹社会，大陆文化犹如稻种一般播撒在这块未经开垦的肥沃土地，迅速结出丰硕的果实——

这是两种文化亲和的硕果，也是两个民族混血的结晶。

混血的弥生人无疑是中国史籍中出现的“倭人”的祖先，古坟时代(4～6世纪)经过与随后而至的北亚骑马民族的再次大规模混血[12]，奠定了现代日本人的基础；而弥生时代开始的水稻农耕，可以说是培育了日本传统文化的母胎。

三、混血的帝王

古代东亚民族之间的血缘交融，形式可谓多种多样，除了边境地区的异族通婚、大规模的民族迁徙等等之外，王室以及贵族之间的政治联婚，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方面。

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春秋至战国的约500余年间，称得上是一个大混血时代，民间的情况自不必说，王室之间的通婚亦相当普遍，逐鹿中原的霸主之中，不乏混血的后代，尤以晋国为显例。

西周时的晋穆侯“取齐女姜氏为夫人”，生子名仇，后为文侯。至春秋，献公伐戎得骊姬姐妹，生奚齐、悼子。献公欲立奚齐，分遣太子申生及公子重耳、夷吾戍边。申生乃齐桓公女齐姜所生，重耳和夷吾为狄人狐氏姐妹所生。以上五子均为混血儿。骊姬为使奚齐继位，用计迫申生自杀，重耳遂奔狄避难，夷吾则入梁求护。献公死，奚齐、悼子次第立，均为晋人里克所杀，夷吾得归晋，是为惠公。初夷吾亡梁，以梁伯之女为妻，生一男一女；而重耳奔狄，亦以狄女为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